

二元经济论与劳动力转移理论

——兼论中国劳动力转移

原 新

摘要 刘易斯创立的二元经济论系统地阐述了城乡之间的劳动力转移模型,拉尼斯、费景汉、乔根森、托达罗等经济学家丰富和发展了这一理论。劳动力转移理论是二元经济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从经济角度精辟地论述了劳动力转移的原因、机制和过程,但也有不足。对研究中国的劳动力转移具有借鉴意义。

作者 原新,男,1962年生,南开大学人口经济学专业博士生;新疆大学人口研究所副所长、副教授。(天津市 300071)

二元经济论是从经济结构阐述经济发展的结构发展理论。在经济结构转变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涉及劳动力转移,本文主要从劳动力转移的角度探讨二元经济论的产生、发展及其理论与实践意义,并对其在中国的劳动力转移和人口流动研究中的借鉴意义进行评述。

一、理论:二元经济论的产生和演进

二元经济论最早由美国发展经济学家刘易斯(W.A.Lewis)在1954年提出,其目的是研究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和劳动力转移过程。刘易斯认为,发展不可能在所有的地区同时发生,发展可能被看成是一种空间分布上的非均衡过程。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结构可划分为两大部门:资本主义部门与非资本主义部门。资本主义部门是指使用可再生资本,并为此支付资本家报酬和为寻求利润而雇用工资劳动者的那一部分经济,它以城市现代工业部门为代表;非资本主义部门(也称维持生计部门)是指不使用可再生资本,不雇用劳动力以谋求利润的那一部分经济,它以农村传统的自给自足的农业部门为代表,这就是常说的二元经济结构。

刘易斯认为,经济发展主要依赖现代工业部门的扩张,经济发展的过程就是非资本主义部门不断

缩小,现代工业部门不断扩大的过程,这一扩张过程需要源源不断地从传统农业部门汲取劳动力。传统农业部门以有限的非再生性的土地为劳动对象,耕地面积的扩展十分有限,无资本投入,生产技术简单且变化缓慢,人口却持续快速增长,劳动力很丰富。根据边际生产率递减原理,其经济收益呈递减趋势,“在那些相对于资本和自然资源来说人口如此众多,以致于在这种经济的较大的部门里,劳动的边际生产率很小或等于零,甚至为负数的国家里,劳动力的无限供给是存在的”^[1]。农业劳动者的收入水平很低,“劳动力的价格是仅够维持生活的最低工资。因此,只要按这种价格提供的劳动力超过需求,则劳动力的供给就是无限的”^[2],农业部门存在“隐蔽”失业。现代工业经济部门使用可再生的生产资料,城市人口的增长速度相对较低,其经济生产规模与生产速度的扩大和提高可以超过人口的增长,同时,接受和使用新科学技术的机会也多,使得劳动力的边际效益递增,劳动者的工资水平较高,但又不可能很高。因为,一方面“维持生计部门的收入决定资本家部门工资的下限”^[3],另一方面,大量流入城市的劳动力会超过工业部门创造的就业机会,二者抑制了工业部门工资水平的升高,其工资水平只能略

高于农业部门的生存收入水平,导致了农村劳动力流入城市寻找就业机会。当现代工业部门按现行工资率提供额外的就业机会时,劳动供给始终多于需求,劳动力供给按现行工资率是弹性无限的。换言之,“资本主义部门由于把剩余再投资于创造新资本而扩大,并吸收更多的人从维持生计部门到资本主义部门就业。剩余越来越多,资本形成也越来越大,而且这个过程要一直继续到剩余劳动力消失为止”^[4],才能用现代工业部门的劳动边际生产率递增取代传统农业部门的劳动边际生产率为零或递减,国民经济方可走上发展之路。

刘易斯的二元经济模式,强调经济部门的结构差异,将传统的总量发展模式推进到结构发展模式,特别是把经济发展过程和劳动力转移过程有机地结合,创立了第一个人口流动分析模型,为人口和经济发展研究开辟了新视野,后人的二元经济发展模式无不受到刘易斯模型的启迪和影响。

1961年拉尼斯(G. Ranis)与费景汉(John. C. H. Fei)合作建立了二元经济模型,被称之为拉尼斯——费模型(也称费拉模型或拉费模型)。费拉模型与刘易斯模型的重大区别是:前者不但考虑了工业部门的发展,而且也充分关注农业部门的发展,并且明确了二者的发展关系,认为农业部门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农业剩余产品的增加是农业劳动力转入现代工业部门的前提条件。劳动力转移过程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农业边际生产率等于零,传统农业部门存在大量显性失业人口,劳动力供给弹性无限大,劳动力从农业部门转入工业部门不影响农业总产出。剩余劳动力进入工业部门后,农业部门出现剩余产品,正好为流入工业部门的就业者提供了粮食保障。第二阶段,农业部门边际生产率提高,其值介于零和不变制度工资之间,农业部门存在隐蔽性失业人口。此时,因为农业边际生产率为正值,当农业劳动力转移后,农业总产品就会减少,平均农业剩余低于不变制度工资,提供给工业部门的农业产品就不足以按制度工资来供养工业劳动者;引起农产品价格上涨,导致工业部门工资上升。第三阶段,农业部门已不存在剩余劳动力,农业边际生产率高于不变制度工资水平,农业部门商业化,农业劳动者的收入水平不再取决于制度工资,而由农业劳动边际生产率和市场共同决定。此时,农业与工业两部门平衡发展,农业剩余劳动力消失,劳动力转移进入商业化时期,相对于每一个工资水平,均会从农业部门

释放出一定量的劳动力^[5]。结论是:农业部门不仅为工业部门的扩张提供所需的劳动力,而且还为工业部门提供农业剩余产品,如果农业剩余不能满足工业发展对农产品扩大的需求,劳动力转移就要受到阻碍。显然,拉尼斯和费景汉的两部门发展及其关系的认识更贴近实际,这是对刘易斯模型的补充和推进。

乔根森(D. W. Jorgenson)1961年提出的二元经济发展理论,否认农业部门存在边际生产率为零的剩余劳动,否认农业与工业的工资水平是固定不变的。假设农业部门无资本积累,农业生产只投入劳动与土地,而且土地固定不变,农业产出只是劳动的函数;土地不是工业部门的生产要素,工业产出是资本和劳动的函数;两部门生产随时间而自动增加。乔根森认为,劳动力从农业部门向工业部门转移的基础是农业剩余的存在(而非劳动剩余)。人口增长被视为经济增长的内生变量,人口增长取决于人均粮食的供给,当粮食供给充分时,人口增长率可达最大生理极限;当人均粮食供给率大于最大人口增长率时,就会产生农业剩余。此时,农业劳动力开始向工业部门转移,工业部门开始扩张,农业剩余越多,劳动力转移规模越大。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原因是消费结构的变化,而不是生产率的提高,因为人口的粮食需求是有限的,对工业品的需求是无限的,当人均粮食生产高于最大人口增长的需求时,农业部门的进一步发展被限制,农业人口转向工业部门生产工业品,以满足人们对工业品需求的扩大。

托达罗(M. P. Todaro)在60年代末至70年代初建立了他的人口流动模型。假设农业部门不存在剩余劳动,而城市工业部门存在大量失业,工业部门的工资水平由政治因素决定,并且是上升的。其目的是研究如何阻止或减缓农业劳动力向城市工业部门的转移,解决城市失业。他认为,农业劳动力向工业部门转移的决定因素,是城乡经济结构差异以及迁移者对迁移成本和效益的权衡,其动力不仅取决于城乡实际收入水平的差异,还决定于城市的就业概率,即取决于城乡预期收入水平的差异。他把农业人口迁入城市就业的可能性与城乡劳动力供需因素有机地结合起来,建立了人口流动模式,即:

$$M = f(d) \quad f' > 0 \\ d = w \cdot a - r$$

式中, M 为乡城劳动力迁移数量, d 为城乡预期收入差, $f' > 0$ 表示劳动力迁移是预期收入差的增函数, w

为城市实际工资率, r 为农村平均收入水平, a 为城市就业概率。

托达罗认为, 依靠工业扩张不能解决发展中国家城市普遍存在的严重失业问题, 解决问题的良策, 一是取消一切人为的城乡实际收入差异的政策和措施; 二是积极发展农村经济, 提高农业生产力, 改善农村生活环境, 缩小工农差别与城乡差别, 减少劳动力的乡城迁移, 否则“尽管成功地寻求现代部门职位的较低概率能够具有长期的稳定作用, 而较高的持久的收入的引诱, 也会继续吸引乡村移民流向日益拥挤的城市贫民窟”^[6]。

二、讨论: 二元结构与劳动力转移理论的评述

劳动力转移模型是二元经济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它精辟地论述了劳动力转移的经济机制, 时至今日, 仍然对研究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力转移问题具有指导和借鉴意义。

首先, 刘易斯二元经济论建立了第一个劳动力转移模型, 以人口流动的经济行为为视角揭示了劳动力转移的根本机制是为了寻求更多的经济机会(就业和收入)。正是由于传统农业部门和现代工业部门的实际收入的差别, 导致人口从农业部门源源不断地流入工业部门。后人又在借鉴刘易斯理论和对世界不同区域发展中国家的研究的基础上, 丰富了二元经济论, 将劳动力乡城迁移的动因归因于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 农业剩余出现(拉尼斯、费景汉), 消费结构的根本改变(乔根森), 农业与工业预期收入的差异(托达罗)等。所有这些分析, 既是对发达国家劳动力转移的经济行为的历史总结, 又是对发展中国家正在经历的劳动力转移现象的阐述, 揭示了乡城经济发展程度与比较利益的差别是劳动力转移的基本经济动力。

其次, 二元经济论把现代经济的发展归因为二元经济结构的转化过程, 认为国民经济重心从传统农业元向发达工业元的转化过程, 就是经济的发展和进步。在经济发展的分析中引入了结构分析的概念, 突破了单纯的总量分析的框架。同时采用定量分析方法, 从数量关系上描述在一定的制度结构假设条件下各种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 从中探讨经济运行的数量关系及各种条件, 既可概括和模拟既有的经济发展经验, 又可预测和探索未来经济发展的可能性和前景。二元经济论将劳动力转移和经济结构转变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既创立了经济发展的结构分析模型, 也丰富了人口迁移和流动的分析方法。

第三, 二元经济论的核心是农业剩余劳动或农业剩余产品对经济结构的转变、经济发展以及劳动力的转移起决定作用。正是剩余劳动力的存在, 不但抑制了传统农业部门收入水平的增长, 同时也制约了现代工业部门工资率的上涨速度, 增加了劳动力市场的竞争, 刺激了经济的发展, 从根本上揭示了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劳动力市场的激烈竞争机制。

当然, 二元经济论对劳动力转移的解释并非完全无可非议, 其假设条件、分析思路和结论也存在一些与实际相悖的方面。

第一, 刘易斯对于农业部门劳动边际生产率为零的假设, 不能适用于所有发展中国家和不同的历史时期。就传统农业部门而言, 虽然边际生产率较低, 但是资源配置并不是完全无效率的, 不可能存在大范围的零值或近似于零值的农业劳动边际生产率, 所以, 无限的劳动力供给在现实中不可能普遍存在。何况, 现实中的农业部门在大量资本和技术投入下, 也正逐步地由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过渡, 农业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 农村逐渐现代化。传统农业部门的劳动边际生产率为零只是一定社会经济历史时期和一定区域的特殊产物, 决非放之所有发展中国家而皆准的普遍现象。

第二, 将二元经济结构地域化, 即以农村代表传统农业经济体系, 城市代表现代工业经济体系, 这有失偏颇。事实上, 无论是农村还是城市, 其经济构成都是很复杂的, 在社会经济发展比较成功的发展中国家, 农村的现代化程度较高, 也存在现代农村工业; 而在一些城市还存在传统的手工业甚至农业。所以, 有些研究中, 针对发展中国家的实际又提出了“三元论”、“四元论”等。

第三, 从刘易斯到托达罗都只从经济学因素(收入、就业、消费等)分析劳动力的转移, 这似乎不很全面。劳动力转移是复杂的社会经济现象, 在宏观上, 不仅受社会、经济、政治、制度、环境、资源等要素的影响, 在微观上还要受个人素质、心理、民族、婚姻、亲情等因素的影响。正如人口迁移均衡模型的创建者哥瑞韦斯(P. E. Graves)和琳内曼(P. D. Linneman)所指出: 人口迁移研究中, 首先要区分可交换的商品和不可交换的商品, 后者指包括气候、自然条件、社会环境、生活质量等非经济因素, 正是由于人们为追求不可交换商品的满足程度, 追求高生活质量和舒适程度, 才促使人口的迁移^[7]。所以, 仅用经济因素分析劳动力转移是不全面的。

第四,二元经济论强调的并非人口流动或迁移本身,而是着重解释劳动力从不发达元向发达元的转移过程、经济机制和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这种劳动力的转移一般被解释为乡城人口迁移。然而,就目前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实际表明,劳动力的转移并不仅仅发生在乡城之间,同时并存的还有农村与农村(农业内部、农村不同产业之间)、城市与城市(工业内部、城市不同产业之间)、甚至城市向农村的劳动力转移。劳动力的转移形式不仅包括二元经济论所论述的异地转移(乡城),还包括就地转移或同部门之间的转移等其他形式。

三、思考:二元经济论对研究中国劳动力转移的借鉴

中国是发展中国家,是一个典型的二元经济社会,但是,中国的经济制度、社会制度以及经济发展模式与其他发展中国家差异较大。在分析中国的劳动力迁移与流动时,二元经济论具有一定的借鉴和启发作用,应该结合中国国情运用,绝不可照搬硬套。

中国的劳动力转移可分为三类:计划迁移、自发迁移和流动,前两者是户口的变迁和永久居住地的改变;后者的户口和永久居住地均未发生变化,人却离开常住地在别处活动。

● 计划迁移。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长期坚持计划经济体制,始终走的是一条优先发展工业并由农业无限地支付工业发展资金的道路,农业对工业的支付不但由工农业商品价格的“剪刀差”去实现,而且还伴随着制度、政策等一系列的城乡差别,产生了事实上的城乡之间的收入水平、经济福利、生活方式等的悬殊差异,形成反差极大的二元经济社会结构。城市一直对人口产生巨大的吸引力,但是受制于强硬的制度安排和严格的政策束缚,特别是粮食供给政策和户籍管理制度,压制了人们的自发迁移行为,农村人口只能是农村人口,即便是存在农村剩余劳动力,也只能在农村自行安置,甚至还将城市的剩余劳动力迁入农村。能够移入城市的少数农村幸运者,也是在国家严格的计划安排下实现的。户口成为森严的壁垒,将人分为两大类:农村人和城市人,农村人口变城市人口的过程不由经济规律和社会需要所决定,而是由政府的计划行为高度控制。中国的劳动力转移主要为计划迁移,尤其是开发性移民,如部队集体转业、“三线”建设、边疆开发、知青支边、上山下乡等,计划移民的主流是从发达元(城

市和条件较好的农村)移向欠发达元(边疆、贫困区、新开发地区),迁移原因一方面是国家生产力布局的需要,另一方面是政治和制度安排的结果,实际上是更多地强调了国家的宏观需要,而未考虑个人利益,即个人利益无条件服从国家利益。可以说,中国的边疆省(区)(如新疆、黑龙江、内蒙古、云南、广西、海南等)的开发建设与社会经济发展无不与计划移民息息相关。劳动力的计划迁移是二元经济理论无法解释的。

● 自发迁移。自发迁移是与计划迁移伴生的人口迁移行为,是完全由迁移者自主决定的,迁移形式主要是农村与农村之间的迁移,严格地讲,是由流动变迁移,即以流动形式离开原居住地,在流入地等待机会,落户定居。自发移民的迁出地主要是贫困地区和经济落后地区的农村,迁入地主要是新开发地区和人口压力较小的地区,迁移的动因是为了摆脱贫困,谋求稳定的生活,自发迁移属个人行为。

以人口迁移大省——新疆为例,从50年代到90年代出现过两次自发移民高峰,一是50年代至60年代初,随着新疆开发建设的步伐加快,特别是生产建设兵团的大规模扩大,虽然有大量计划移民,劳动力依然严重短缺。一方面兵团劳动者是拿工资的农业职工,就业容易而且收入稳定,另一方面,由于国家工资政策的倾斜,边疆津贴较高,相对工资高于内地,吸引了甘肃、陕西、四川、河南等地大批农民自发迁入,之后逐渐举家迁移,落户定居。二是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因兵团前期计划移民大量返迁,造成劳动力不足,通过到内地人口稠密地区和相对贫困区动员和招募移民(本质上是自愿)、安置流动到兵团并愿意定居的流动人口等办法,又形成了一个迁移高峰。目前,兵团的220万人口中的4成左右为新移民,劳动力的2/3是新移民,他们的主要来源地仍然是四川、河南、甘肃、陕西等省。来兵团不但就业能保证,而且收入水平也比迁出地高。1990年兵团的人均年工资收入和上述省份的农民人均纯收入相比,分别高于甘肃489元、陕西458元、河南398元、四川361元。这完全符合二元经济理论的劳动力转移的经济机制的分析。然而,这里的吸引和排斥劳动力转移的二元并非刘易斯理论中的二元,这里的二元均是以农村为代表的传统农业,区别是“推力元”是人多地少、人口严重压迫土地、贫困、就业不稳定且机会少的农村地区;“吸力元”为人地矛盾小、收入相对较高、机械化程度高、就业稳定的农村或农

场。

● 人口流动。自改革开放以来,遍及全国的人口流动愈演愈烈,规模逐年扩大,范围日趋广泛,形式日渐多样、频率不断加快,其主流是从农村流向城镇、从落后和贫穷农村流向相对富裕的农村、从人口稠密区流向人口稀疏区、从中西部流向东南部,这一趋势充分反映了区域间和城乡间的商品经济和社会交往的加深以及劳动力资源的重新组合与优化。

流动人口产生的主要原因:一是农村的人口控制政策一直比城市宽松,人口增长率高,劳动力及后备劳动力资源丰富,相对应的土地资源十分有限,人均耕地少,农村人口相对于落后的农村生产力和有限的土地承载力,出现劳动力过剩。二是中国是农业和人口大国,为满足 12 亿多人口的日益增长的生活水平的需求,发展高效、优质、高产农业势在必行,客观上要求加快农村现代化建设,转移剩余劳动力。三是城乡间和地区间的非均衡发展,形成了悬殊的比较利益差,追逐经济利益成为劳动力转移的内在动力。四是流动人口已成规模,既减轻了流出地的人地矛盾,又弥补了流入地的劳动力不足,成为城市传统经济部门不可或缺的劳动力资源,已融入城市社会经济系统。五是虽然完全自由的劳动力转移尚不可能,但是制度安排中限制劳动力转移的政策正在弱化,流动人口现象也正被人们所理解和接受。六是农村人口的观念正在改变。传统的唯安为本、固守土地的价值观念正被参与市场竞争、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所取代。

中国流动人口现象的产生是极其复杂的,二元经济理论可以被用来从经济角度分析这一问题,但有局限性,只有将这一理论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修正和完善,才能成为适合认识和解决中国劳动力转移问题的理论。

● 结论:(1)二元经济论只是对劳动力转移的经济机制和经济行为的分析,现实中的劳动力转移

是一个复杂的人口经济现象,涉及宏观、微观、经济、社会、自然等众多领域,而各个国家的国情又千差万别,仅仅用经济分析就想概括劳动力转移的全貌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全面的。(2)中国劳动力的计划迁移是强硬的政府行为,是根据国家建设的需要在政府的直接安排下进行的劳动力的区域调配,不受个人经济意愿和行为的支配,是个人利益对国家利益的服从,二元经济理论根本不能解释这类劳动力转移现象。(3)劳动力自发迁移是由自我意愿引发的自觉自愿的迁移,是主要受经济利益驱动的最稳定的劳动力转移形式,虽然迁出和迁入的二元与西方理论中的二元不一致,但是二元经济论的基本分析方法是适用的。(4)人口流动虽然也是自发的劳动力转移,但是是不稳定的,具规模大、范围广、动因和背景复杂、形式多样、流动频率快、盲目等特点,虽然流动的主要原因是谋求经济利益,但是不能完全用二元经济理论解释,它只部分适用。(5)中国的市场经济体制并非完全等同于西方的市场经济体系,虽然中国市场经济体制正在逐步完善,中国的经济市场化、劳动力流动自主化,更贴近于二元结构理论的背景,然而,劳动力的流动依然是在政府的户籍管理和宏观调控之下进行的,中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国情差异较大,引用西方的劳动力转移理论分析中国的问题,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进行必要的甄别和修正,使之适合中国国情,绝不可原样照搬。

参考文献:

- 1 2 3 4 阿瑟·刘易斯[美].二元经济论.北京: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9.1-46
- 5 谭崇台.发展经济学.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292-299
- 6 马侠.人口迁移理论与模式.人口与经济,1992(3):38-46
- 7 范力达.人口迁移的均衡模型与非均衡模型研究评述.中国人口科学,1994(5):1-7

(上接第 53 页)

- 4 北京大学人口所.控制人口与发展经济.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
- 5 同 2
- 6 曾毅.人口分析方法与应用.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
- 7 加里·贝克尔著,彭松建译.家庭经济分析.北京:华夏出版社,1992
- 8 彭松建.西方人口经济学概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
- 9 同 7
- 10 同 8